

儿童的能动性：一个整合的解释框架

肖莉娜 袁 园

【摘 要】儿童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就是弥合儿童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在理论发展上的差距,特别是如何超越结构与能动性的二元对立。本文以整合性的视角为导向,考察能动性、结构和文化三个核心概念的发展脉络和相互关系,探讨其在儿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一个关于儿童能动性的解释框架。

【关键词】能动性;结构;文化;儿童社会学

【作者简介】肖莉娜,华东理工大学华东社会发展研究所讲师(上海 200237);袁园,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7)。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19.2.72~7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中国儿童观建构的社会学研究”(项目号:18BSH015)的阶段性成果。

国内的儿童研究正在慢慢兴起,但现有研究所依据的范式大多来源于儿童发展理论、社会化理论和相关的家庭研究,它们都将孩子看作是“未成年且成长中的人”而非“成熟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它们的基本假设是,童年是成年前的准备时期,是孩子们逐渐获得成年人特征的阶段^[1]。如此一来,儿童被这些理论化的概念建构为一个缺乏理性和智慧的、成年人的“未完成式”,所以他们亟待被保护和被控制。也正是如此,主流的研究总是探讨“他们的需要是否被满足”而非“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2]在这样的理论范式下,儿童被置于家庭和学校研究之下,他们逐步向成年阶段发展的社会化过程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而其作为“儿童”的生活体验却被抛诸这些研究的路径之外。

西方学术界的儿童研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是被这样一种视儿童为“自然、消极、无能与不完整”的范式所主导。直到1980年代,在Zelizer“为无价的儿童定价”^[3],Corsaro“早期的友谊与朋辈文化”^[4],Qvortrup“将儿童置于劳动分工之中”^[5]等研究的推动下,新儿童社会学发展才对上述研究范式提

出质疑和挑战。新范式认为,应该从儿童自身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儿童”,将他们视作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中积极的行动者而非被动消极的客体;“童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是兼具结构性和文化性的社会要素,其本身就构成社会分析的变量,与阶级、性别及种族等其他社会要素是相互影响的。^[6]

能动性和结构性,构成了新儿童社会学的两个关键概念。由此,有关儿童的社会学研究发展出两条清晰且截然不同的研究脉络。第一类研究将儿童视为积极主动的社会成员,认为他们有能力对自己的生活做出具体且独特的改变。此类研究注重儿童的日常互动和生活体验,但偏于微观,常常忽略宏观社会结构对儿童的影响。^[7]第二类研究则更多关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场域的结构形式的童年,而不是具体的儿童。^[8]此类研究考察的是历史、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以及政治等宏观社会结构对童年的影响,关注的是作为儿童的宏观意义和整体性体验,往往忽略儿童作为社会角色的能动性,认为这只是基本的、自发的人类特质,无须过多解释。^[9]

实际上,儿童研究中的能动性和结构性的二元

对立,直接源自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二元性。^[10]然而,面对社会日益增长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流动性,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突破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将更多的精力投放于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能动与结构的动态关系和互动中。虽然在这一股浪潮中,儿童社会学总体上是相对滞后的,但也有些儿童领域的学者关注到这一理论上的争论。比如,Tisdall 和 Punch 批判性地指出,不能将儿童的生活过分简单化,在探讨儿童的能动性以及主观经验时需要考虑他们所面对的“难以理解、错综复杂、充满紧张、模糊不清且矛盾交织”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影响。^[11]Mayall 也强调,要在持续变化且辩证的主客观互动中考察儿童的能动性,在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情境背景中,从儿童的观点与视角出发,讨论儿童与宏观情境的互动。^[12]为了回应这一理论关切,弥合儿童社会学与主流社会学在理论发展上的差距,本文将以整合性的视角为导向,考察能动性、结构和文化三个核心概念的发展脉络和相互关系,探讨其在儿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关于儿童能动性的解释框架。

儿童的能动性:概念的辨析

在大多数有关儿童和童年时期的经验研究中,能动性概念的使用主要沿袭的是启蒙传统,即将能动性与“理性以及自我意识觉醒之下不受限制的社会性自由”等同起来^[13],重视个体的意图、动机、理性、选择和目的,忽视能动性也同样被社会规则、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和宏观话语所建构。此类研究更多地把焦点放在儿童自身的能力、智谋和自主性等体现能动性的积极的、有优势的和理性的层面上^[14],因此也被批评无视个体行动的非理性因素^[15]。

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儿童能动性中的“反抗与斗争”方面。^[16]这一理论取向实际上是从底层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社会运动研究以及其他聚焦于无权者和被压迫群体的研究中发展而来的^[17],因为就被排斥和被边缘化而言,儿童与女性、黑人、移民等弱势群体并没有什么不同。此类研究中,个体对权威的反抗受到高度重视^[18]。但是,

这种过分强调能动性中“反压迫”部分的概念解释难免流于片面^[19],捕捉不到能动性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因为在反抗的同时,接受认同、调适适应甚至有意地选择性忽视都可能成为边缘群体面对压迫的策略选择。^[20]

近年来,也有不少儿童研究领域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单向度的、孤立的能动性概念是难以深刻全面地解释儿童复杂多变的生活和体验的,他们尝试使用“弱能动性(thin agency)”“受制的能动性(restricted agency)”“有限的能动性(limited agency)”和“策略式能动性(tactical agency)”等概念来表现儿童的能动性与他们所处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的矛盾交织。^[21]这样的概念化操作,进步之处在于其结构性视野,但局限也非常明显,就是把结构的影响固化在能动性概念之上,仅仅只看到了结构性要素对能动性的弱化和限制。

回看主流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学家们就开始尝试打破结构和能动的二元对立,强调能动性与结构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最具影响力,其将社会现象解释为一种能动与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据吉登斯的论述,社会结构在促成和限制人们行为的同时,人们的行为也同样可以塑造社会结构。也就是说,个体可以在结构性限制和资源下能动地做出自主选择,并且反身性地检视自己和他人的行动,尽管这些选择常常是例行化实践。^[22]布迪厄则进一步提出了惯习(Habitus)的概念,他认为能动性不仅包括反身性行动,还包括非反身性的部分。^[23]根据布迪厄的定义,惯习并不是个体自由意志下自发形成的,而是源自个体在不同社会场域内的持续互动。^[24]通过将“能动和结构”定义成互为彼此构成部分的两个要素,布迪厄和吉登斯极大地推动了能动性相关理论的发展,对相应的经验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5]尽管如此,仍有批判评者认为,这一理论范式将结构与实践捆绑得过于紧密,以致无法充分展现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两者间关系的变化发展。^[26]此外,在他们的理论中,“能动性”概念本身从语义上仍然呈现出模糊不清、抽象晦涩的特点,从分析运用的角度看操作性也不强,因此,这一概念也期待一种更

加深刻详尽和综合全面的理论阐释。^[27]

在推进能动性概念清晰化以及可操作化的发展上,Emirbayer 和 Mische 做出了重要贡献。^[28]他们指出,能动性应该包含不同的面向和维度,并且应该放置于流动的时间中去考量,以便全面地揭示其复杂性。因此,他们将“能动性”定义为:

一种被时间所建构的行动介入过程,其中,行动者处身于复杂多样的结构环境——即行动的“时间—关系”结构——通过交织运用习惯、想象和判断等行动策略,交互式地回应持续变化的历史情境中涌现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和改变。^[29]

根据这一定义,能动性被概念化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植根于时间—关系的结构化社会情境,并与之产生持续的互动。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互动和参与过程,能动性既“受益于过去(在惯习这一方面),又导向未来(作为一种想象多种未来可能性的能力),并落脚于当下(作为一种综合过去的习惯和未来的筹划以应对眼前偶发状况的能力)”。^[30]与这三个时间面向相对应,Emirbayer 和 Mische 将能动性解析为三个重要的构成要素:重复(Iteration)、筹划(Projectivity)以及实践性评估(Practical evaluation)。

重复(Iteration)是一个以过去为导向的要素,是对过去的重现和例行。它表明,个体能够有选择地激活过去的思维图式和行为方式,以例行的方式融入当下的实践活动中,以此来维持稳定、秩序、认同,意义及持续性互动。^[31]重复这一要素与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吉登斯的“例行化实践(routinized practices)”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三要素里最受系统性关注和应用的一个维度。在儿童研究领域里,Willis 对工人阶级孩子如何“学做工”的研究^[32],以及 Corsaro 对儿童朋辈文化的研究^[33]都展示了能动性的“重复”面向:即儿童如何在成人行为模式的影响下通过自己能动的创造性参与最终实现对已有的社会结构/文化的再生产。

筹划(Projectivity)是一个以未来为导向的因素,是对未来的想象/创造/形塑。它表示,行动者可以根据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恐惧和渴求来创造性地重构他们已有的观念和和行为结构,并且通过想象构思出

未来行动的轨迹。^[34]这一要素的重要性在于肯定个体可以突破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去产生变革性的思维/行为方式。这一点对于研究儿童——一个在现有社会权利结构中处于弱势的群体——而言更是意义重大:儿童群体由于其年龄结构的影响,改变现状很难,通常要更多的倚重于对未来的想象,通过努力去冀望未来的各种可能性。近年来儿童研究领域内关于“希望”与儿童生活体验、身心健康以及学业成就之间关系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能动性的未来面向的关注。

实践性评估(Practical evaluation)是一个以当下为导向的要素,是对当下的即时回应/决策。它表示,行动者在面对现实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模糊、矛盾和不确定性时,有能力即时地判断和选择应对方案并予以执行^[35],即使此前他们并未经历过与之类似的情景。这一过程是一种应对实际情况的紧急判断,并非毫无异议地执行已有的行为准则,也正因如此才能发展出个体对旧有行为方式做出改变的潜能。与这一要素相关的经验研究常常关注的是即兴发挥、临场决断的场景,Corsaro 在对学前幼儿如何策略性地解决集体冲突的分析中就运用了实践性评估的维度。^[36]

不过,Emirbayer 和 Mische 也特别指出,这三种不同的主观能动性的构成面向只是理论上的区分,作为分析框架时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但在现实的人类行为中,过去、未来和当下的经验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和影响到个体实践。因此,反复、筹划和实践性评估是相互交融的,尽管在某个具体情况下其中某一个面向会占据相对主导地位。^[37]从这个意义上,Emirbayer 和 Mische 将他们发展的能动性的理论框架定义为“三和弦”。^[38]这种将时间视角融入能动性研究的方法,有助于解析个体与结构持续互动的动态过程,因为它指出个体可以通过调整时间面向来转化自己跟结构的关系,从而可以通过灵活地组合运用反复、筹划和实践性评估等策略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境。

儿童研究学者 Corsaro 曾经尝试全面运用 Emirbayer 和 Mische 的能动性理论框架来解释儿童如何在同辈文化中实践他们的能动性,但是他主要考察

的是校园场景内的儿童同辈文化和实践行动,而儿童所嵌入的更广泛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在他的研究中没有呈现。^[39]这实际上延续了他一直以来的微观取向,所以也不能充分展现 Emirbayer 和 Mische 的能动性理论在突破能动—结构二元对立方面所做的贡献。要全面理解他们提出的“能动性”的过程观,不能只是就“能动”说“能动”,还必须更深入地认识行动者处身的“结构化社会情境”。

结构与文化:理解能动性的脉络

很多儿童研究在处理“能动性”与“结构”的关系时都倾向于将结构性的要素视为对能动性的弱化和限制。这实际上承袭了社会科学领域对于社会结构的传统认知,即将其视作为主导性的、僵化的以及静态的社会存在,是对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然而,当我们重新调整有关能动性的概念以及试图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类行动中所具备的能力和效力时,动态的、流动性的概念需要重新注入对“结构”的解释中。因此许多学者特别关注社会互动的动态和变化过程,认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塑造的。其中,吉登斯的二元结构论占据重要地位,该理论极大地发展了近年来有关社会结构的理论性思考和经验研究。他在论述“结构化”时强调了结构的二元性,社会结构既是社会实践发生的媒介,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一方面,社会结构形塑并构成了能动性,另一方面,能动性重置和再现了社会结构。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结构不仅仅限制了能动性的发挥,同时也能为人类的自主行动提供有利的资源和机会。^[40]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结构化”意味着社会结构不应该被定义为某种“静态不变”的概念,而更应该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尽管二元结构论创造性地指出社会结构和能动性相互形塑且相互作用,但是在大多数理论研究中,社会结构本身的核心含义仍然没有得到详细的阐述,社会结构的主要部分组成仍然不明确。吉登斯曾经尝试给出更为具体的解释:“社会结构包括社会规则和社会资源,并与社会系统的再生呈现递

归性相关,只有当人类的历史记忆可以回溯、人类的知识基础可以有机地夯实,以及人类的行为可以实例化呈现时,社会结构才真实存在。”^[41]他还进一步阐述了社会结构的内涵,将“社会规则”视作为“普遍化的程序在社会生活中的展演和重现”,将“社会资源”视作为“社会互动的常规过程中,变革性力量所能应用和利用的媒介和工具”,且常常被表现为一种权威官方的、宏观配给的形式。^[42]然而,有人批评吉登斯有关社会结构的观念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他并没有将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因素纳入实际的概念阐述中;无论是物质性的社会资源还是非物质性的人类社会资源,诸如人类的知识体系、情感性承诺等,都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产生并发生作用的。^[43]除此之外,也有人批评,吉登斯的社会规则概念并不能区分“形而下的正式的明确的社会发展模式”与“形而上的非正式的非清晰的图式、隐喻和假设”。^[44]

要回应吉登斯面临的这些挑战,一个可能的改进方式就是将文化(即指并不与特定的实践和位置相关联的形而上存在)和社会结构(即指真实特定的时空中的形而下存在)两个概念区分开来。Sewell 就提出,文化图式与真实存在的社会资源不同,尽管两者存在着持续且相互作用的关系:文化图式需要真实存在社会资源作其载体才能源远流长继承不朽,而社会资源也需要文化图式来展示其可利用之处和社会性价值。^[45]除此之外,他还重新调整了吉登斯有关社会资源的定义:任何能够在社会互动中发挥功效之力量都能够被称之为“社会资源”。

Sewell 的确进一步澄清了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成并有助于理解社会结构相关的核心概念,但把结构分成社会资源和文化两个部分,文化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就会被当作是社会结构和主观能动性关系下的次一级关系。低估文化的影响力,并将其视为相较于强硬的社会结构更为松动的次一级因素,文化图式与社会资源之间相互持续影响的关系也会被忽略。因此,将文化这一概念从社会结构这一概念中剥离出来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有助于研究者探索文化作为一种独立要素,形塑社会结构和能动性的过程以及被影响的反方向过程。

很多现代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研究认为“文化”是稳定的且始终如一的。然而,这一观点也受到一些社会学理论家的挑战,他们认为文化内部的悖论和矛盾以及不同文化之间差异并未得到正确的理解,因而有必要讨论文化对主观能动性施加的改变和影响。^[4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者 Swidler 将“文化”概念化的过程视为一种协助分析的“工具箱”,其分析方法适用于探索文化、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结构的互动过程,为其提供了一种具备实践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47]

Swidler 借鉴了 Geertz 的研究。Geertz 关于“文化”的定义是:一种历史性的、可传播的、表现为符号的图式,其具有标志和符号含义的形式,能够表达携带历史基因的、系统化的意义和内涵,并在人类的沟通和记忆传承的过程中进行散播,人类所发展知识体系以及人们对生活所呈现态度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48]在此基础上,Swidler 补充道,文化是“工具箱”,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世界观和一种行为习惯,也是能够为人所利用的工具,为了解决不同问题需要采取的不同行动策略,掌握主动权的人们可以在其文化背景中做出自洽的选择,甚至人们可以重新排布和组合“文化”这一工具箱。^[49]这一概念将行为主体从文化决定论中解放了出来,人们不再只是被文化所形塑,人们也可以反作用于文化。^[50]这一观点为文化和人类行为关系的研究提供借鉴意义,研究者不仅可以明确文化激发以及限制人类行为的过程,也可以清楚地理解人类行为反作用于文化的动态路径。除此之外,在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的变迁时,Swidler 认为,愈是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文化的影响就愈显著,因为不安定的环境使得人们对于自身社会位置的焦虑加剧,而且在面对不同的紧急事件时,人们也愈发渴求在合适的文化氛围中寻求出路。^[51]她还认为,社会变迁可能引发文化模式的更新和交替,新的文化由此兴盛并发挥作用,而这种结果显然也必然受到其他宏观结构性的因素以及人类所采取的行为策略的影响。这也恰恰呼应了 Sewell 的观点,文化图式需要承载于其他实体的社会资源才能持续发挥作用。^[52]

在儿童和童年时期的研究中,已经确立的前提

和假设是: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必须置于他们所生存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考量。但是,现有文献更多的是停留在微观层面上讨论儿童的能动性,关注的结构性元素主要是家庭关系、同辈文化、儿童服务等,侧重的是儿童的日常生活体验以及他们如何理解、表达和应对这些体验^[53];而那些关注宏观结构与文化的儿童研究,则更倾向于讨论全球化、工业化、个体化、民主化、商业化、移民浪潮、社会福利、贫穷与社会不平等宏观议题对儿童的影响,较少从能动性的角度去讨论儿童与这些宏观社会结构、文化的协商互动过程。^[54]

实际上,在讨论儿童、家庭以及代际间的关系时,不可避免地需要了解定义这些关系的宏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儿童并不是结构和文化的傀儡,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参与方式和资源运用方式对其身处的结构和文化进行选择、建构并产生影响,只不过儿童在与成人面对同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变迁时,可能会因为社会力量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应对策略。^[55]因此,使用动态结构观和“文化工具箱”的理论方法,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呈现儿童所处环境的流动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敏锐地捕捉到儿童在与结构文化环境互动过程中是如何进行选择并采取行动的。

探索性理论整合

James 认为儿童研究的理论框架本质上应该跟纺织一样,“因为我们需要将现有儿童研究的不同流派整合起来,织成一块完整的布料……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关注、分析和理解童年的共性和特性。”^[56]也就是说,为了尽可能多地借鉴现有的成果,经验研究需要弥合不同研究传统之间的裂缝,实现理论性的整合。本文正是以此种整合性的视角为导向,尝试提出一个能体现“能动性、结构和文化”三者动态关系的儿童能动性的解释框架。

正如前文所述,现有的关于儿童能动性的研究更多采用的是微观互动论的方法,更广层面上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常常只是被视为一种外在的限制性要素,而非动态互动过程中的内在要素。因此,研究者

并不能有效解释结构、文化和能动性三者间的复杂关系。为了更好地在动态过程中理解儿童的主观经验和能动性,并充分考虑与文化和情境的持续互动,一个整合的解释框架需要将结构、文化和能动性相互链接:一方面,社会结构和文化通过资源条件和限制约束的改变形塑能动性;另一方面,儿童的能动性也可以重新塑造和反作用于社会结构和文化。除此之外,社会结构和文化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关系的关系。

这一框架的核心是要将能动性视为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行动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情境中涌现的各种问题时,有能力在结构和文化提供的资源和限制下选择不同的时间面向形成不同的行动策略加以应对,从而影响结构和文化的重复和发展;而被能动性的实践所改变或再生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反过来又成为行动者后续的能动性实践的社会历史情境。这样的互动过程是行动者与结构和文化情境之间持续的协商互动。因此,在这里,结构概念也被注入了流动性,指向的是社会互动过程中与主观能动性相互形塑和作用的现实的持续变化的社会过程和现实;而文化也不再被视为稳定的、内在一致且一成不变的,而是充满悖论和矛盾的、可以供行动者选择、排列和组合的符号形式的工具。

中国的儿童正受到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的影响,在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他们所面对的生存环境、文化价值观和政策体系都在变化之中,呈现出分化和多样。^[57]在这一变革动荡的时代,他们置身于极端复杂的现实关系网络中,既伴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又面临不平等、流动性与脆弱性的风险。^[58]新旧文化的更替、发展和交织并存,既可能导致他们选择时的迷茫和无所适从,也可以活跃他们的思想,丰富他们的行动策略。^[59]因此,我们提倡采用一种动态把握结构、文化与能动性关系的整合解释框架来考察儿童不断变化的主观倾向和行动策略,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社会转型给儿童生活带来的复杂性,揭示他们动态变化的生活体验和应对策略。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儿童福利政策的制定者看到儿童是以自己的方式与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进行协商、抗争和适应,促使

他们更加重视儿童应对社会变迁的潜能,更多地考虑儿童的视角与儿童的参与,从而真正建构符合儿童最大利益的政策与服务。

参考文献:

- [1][6]A. Prout, A. James.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 Routledge, 2003.
- [2]D. Devine, "Children's citizenship and the structuring of adult-child relations in the primary school", *Childhood*, No. 3, Vol. 9(2002), pp. 303-320.
- [3]V. A. Zelizer.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 [4]W. A. Corsaro. Friendship and Peer Culture in the Early Years, Norwood, NJ: Ablex, 1985.
- [5]J. Qvortrup. "Placing children i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Family and Economy in Modern Socie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5, pp. 129-145.
- [7][54]S. Shanahan, "Lost and found: The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toward childhood",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3 (2007), pp. 407-428.
- [8]J. Qvortrup, M. Bardy, G. Sgritta, et al., *Childhood matters: Social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tics*, Avebury, 1994; A. V. A. Zelizer, "The priceless child revisited", In *Studies in Modern childhoo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184-200.
- [9]A. Prout, *The Future of Childhood*, London: Routledge/Falmer, 2005.
- [10][56]A. L. James, "Competition or integration? The next step in childhood studies?" *Childhood*, No. 4, Vol. 17(2010), pp. 485-499.
- [11]E. K. M. Tisdall, S. Punch, "Not so 'new'? Looking critically at childhood studies", *Children's Geographies*, No. 3, Vol. 10(2012), pp. 249-264.
- [12]B. Mayall, "An afterword: Some reflections on a senar series", *Children's Geographies*, No. 3, Vol. 10(2012), pp. 347-355.
- [13]L. M. Ahearn, "Language and agenc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No. 1, Vol. 33(2001), pp. 109-137.
- [14]W. A. Corsaro, *The Sociology of Childho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7.
- [15]H. Ferguson, "Welfare, social exclusion and reflexivity:

The case of child and woman protectio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No. 2, Vol. 32(2003), pp. 199-216.

[16]L. I. Bordonaro, "Agency does not mean freedom. Cape Verdean street childre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ldren's agency", *Children's Geographies*, No. 4, Vol. 10(2012), pp. 413-426.

[17]K. Valentine, "Accounting for agency", *Children & Society*, No. 5, Vol. 25(2011), pp. 347-358.

[18]L. I. Bordonaro, R. Payne, "Ambiguous agency: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interventions with children and youth in Africa", *Children's Geographies*, No. 4, Vol. 10(2012), pp. 365-372.

[19]S. B. Ortner, "Resistance and the problem of ethnographic refusal",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No. 1, Vol. 37(1995), pp. 173-193.

[20]A. E. MacLeod, "Hegemonic relations and gender resistance: The new veiling as accommodating protest in Cairo",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No. 3, Vol. 17(1992), pp. 533-557.

[21]A. Honwana, "The pain of agency", In *Makers and Breakers Children and Youth in Postcolonial Africa*, Trenton, N. J.: Africa World Press, 2005, pp. 184-200; N. Klocker, "An example of 'thin' agency: Child domestic workers in Tanzania", In *Global Perspectives on Rural Childhood and Youth*,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83-94; S. Punch, *Negotiating migrant identities: Young people in Bolivia and Argentina*, *Children's Geographies*, No. 1-2, Vol. 5(2007), pp. 95-112; E. Robson, S. Bell, N. Klocker, "Conceptualising agency in the lives and actions of rural young people", In *Global Perspectives on Rural Childhood and Youth: Young Rural L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135-148.

[22][40][41][42]A.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3]P. Bourdieu,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4.

[24]P.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25]W. H. Jr Sewell,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1, Vol. 98(1992), pp. 1-29.

[26]M. S. Archer, *Culture and Agency: The Place of Culture i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M. A. Dobres, J. E. Robb, *Agency in Archaeology*, Oxon: Routledge, 2000.

[30][31][34][35][37][38]M. Emirbayer, A. Mische, "What is

agen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4, Vol. 103(1998), pp. 962-1023.

[32]P. Willis, *Learning to Labour*, Farnborough: Saxon House, 1977.

[33]W. A. Corsaro, "Interpretive reproduction in children's peer culture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92, pp. 160-177.

[36][39]W. A. Corsaro, *Collective action and agency in young children's peer cultures*, In *Studies in Modern Childhoo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231-247.

[43]C. G. A. Bryant, D. Jary, *Introduction: Coming to terms with Anthony Giddens*, In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Routledge, 2000, pp. 1-31.

[46]M. S. Archer, *Structure, Agency and the Internal Conver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7][49][51]A. Swidler,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No. 2, Vol. 51(1986), pp. 273-286.

[48]C.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50]O. Lewis,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No. 4, Vol. 215(1966), pp. 19-25.

[53]H. B. Johnson, "From the Chicago School to the new sociology of children: The sociology of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99",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Vol. 6(2001), pp. 53-93.

[55]J. Qvortrup, W. A. Corsaro, M. S. Honig, *Why social studies of childhoo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andbook*,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hildhood Stud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1-18.

[57]岳经纶、范昕:《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回顾、反思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林晓珊:《“购买希望”:城镇家庭中的儿童教育消费》,《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4期;肖索未:《“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6期。

[58]肖莉娜:《大转型的孩子们:儿童福利政策的反思与建构》,《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59]E. C. L. Goh, L. Kuczynski, "Agency and power of single children in multi-generational families in urban Xiamen, China", *Culture Psychology*, No. 4, Vol. 15(2009), pp. 506-532; D. Y. F. Ho, "Filial pie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In M. H. Bond(eds.),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55-165;景军:《喂养中国小皇帝:儿童、食品与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